

张仲景

方证理论体系研究

贾春华 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理科基地项目资助

张仲景

方证理论体系研究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仲景方证理论体系研究/贾春华著.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7-117-13379-1

I. ①张… II. ①贾… III. ①伤寒杂病论-经方-
研究 IV. ①R222.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1157 号

门户网: www.pmph.com 出版物查询、网上书店
卫人网: www.ipmph.com 护士、医师、药师、中医学
师、卫生资格考试培训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张仲景方证理论体系研究

著 者: 贾春华

出版发行: 人民卫生出版社(中继线 010-59780011)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 19 号

邮 编: 100021

E - mail: pmph@pmph.com

购书热线: 010-67605754 010-65264830

010-59787586 010-59787592

印 刷: 潮河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字 数: 174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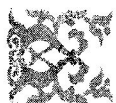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117-13379-1/R·133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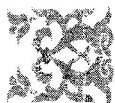
定 价: 18.00 元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59787491 E-mail: WQ@pmph.com

(凡属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销售中心联系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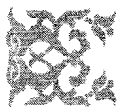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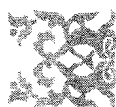


贾春华,男,1961年10月生于河北省香河县。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医临床基础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

曾就读于河北、安徽、北京的3所中医学院,11年的求学历程,分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在《金匱要略》专家周夕林先生、《伤寒论》大师刘渡舟教授指导下研究张仲景医学。从事临床、科研、教学26年。首届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遴选状元,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称号;诊治患者15万人次;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科研课题十余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3项;出版学术著作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自序：中医理论思辨录



晚近时常思考的是这样的一些问题：中医学究竟在使用一种什么样的语言？这种语言蕴含什么样的逻辑？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来刻画中医所谓的“辨证论治”？中医理论是如何指导临床实践的？或我们究竟是如何应用中医理论的？我们凭什么相信中医理论？如此这般的问题都将指向一个节点，那就是中医的语言问题，这种语言涉及的逻辑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将如何理解、解释中医学的语言？

笔者曾多次强调：“中医语言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中医逻辑是一种旨在发现而不重证明的逻辑。”时常回响在我耳边的那个声音是伽达默尔于《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中所说的那段话——“一切理解都是语言问题，一切理解都在语言性的媒介中获得成功或失败。一切理解现象，一切构成所谓诠释学的对象的理解和误解现象，都表现为语言现象。”

1. 中医学是一种以身体经验感知为基础而形成的理论。任何一种理论必备的就是这一理论的解释性，故中医学理论首先是一种关于解释的理论；在不可能超于肉眼观测的时代，解释的理论应该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理论；隐喻认知的主要形式是“近取譬”，即取我们周边的事物以说明我们不清楚的事物；“近取譬”是关乎我们身体的经验。在研究中医这种隐喻性语言中，首先要解决的是“隐喻语言的双重指称”或称之为“隐喻语言的二阶指称”问题，就是当我们说“S是P，意指R”的问题。中医学语言与西医语言是两套不同的语言，它们对人体生理、病

理、治疗等内容的言说具有不同的范式，在两种不同语言的互译中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可以套用的公式，如果你要寻求这一公式，那么你走错了路。甚至可以说两种语言间根本不存在完全翻译的可能。

2. 《伤寒杂病论》究竟应用的是一种什么逻辑？这个问题要从不同的阶段作出回答。学习的初始阶段，我们会将经典条文作为一个个命题，并将一个个命题作为一条条规范，它可以隶属于命题逻辑和规范（道义）逻辑范围；临床应用阶段可以说是一种选择逻辑，即我们在已掌握的命题中寻求与临床表现相同或相近的条文以应用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证相应”。当然这是最为简单的区分，其实中医治病所涉及的逻辑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广义模态逻辑，是一种集知识、信念、道义为一体的动态逻辑。

3. 在中医学中起码存在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依据划分标准及目的的不同可以赋予不同的名称。可以简单地说中医学中存在“辨证论治”与“方证论治”两大系统，“辨证论治”系统更具有探索性，在理论的建构上更具有优越性；“方证论治”更侧重于应用性，在临床应用上有着优先的地位。但这并不等于说“辨证论治”系统不能应用于临床，它在那些未有确切疗效的新疾病发生时发挥着重大作用；“方证论治”用于已有确切疗效的疾病的治疗更为简捷。两大系统的区别犹如计算机的发明与使用。

4. 是我们发现了中医学中的脏腑功能，还是我们将某些功能指派给了某些脏腑？这就像某人与生俱来地具有吃饭、睡觉的本能与给某人赋予了一定的社会职责一样，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一种先天的，而所赋予的某种职能则是后天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在非病态的情况下是不会出错的，而所赋予的某种职能则很难做到尽善尽美。中医学中脏腑的功能是与生俱来的，还是我们将某类系列的功能赋予了相关的脏腑，这是解读中医学的关键问题，也是多年来人们没有谈及的或不愿谈论、不敢谈论的问

题。以本人对中医学的认识，中医学中脏腑的功能，虽然有些是伴随相关脏腑与生俱来的，但脏腑理论中那些脏腑的功能更多的是被一些理论学家指派的，是他们赋予了脏腑一些相关的功能。

5. 在中医病因病机的研究中，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中医病因病机的世俗来源就把它当成了一成不变的东西。可以说中医学中关于病因的“六淫”“七情”学说是一种对世俗观念的借用。“风、寒、暑、湿、燥、火”的病因概念是人们在概念形成过程中应用了自然界风、寒、暑、湿、燥、火的“原型”而形成的概念隐喻。它的应用是跨域的，即将始源域的图式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上，通过始源域的结构来理解目标域。其理解类似于：当你听到S是P时，如果要知道P的可能值，可寻找S与P可能相似的地方，要确定S与P可能相似的方面，可寻找P类事物明显的、众所周知的、不同于其它事物的特征。且此六淫并非六个“个体”而是六个“范畴”，它只是对自然界存在的致病因素的一种归类。

6. 证候的诊断主要在于主客观的统一，主要依据病人的临床表现与医生头脑中有关证候诊断标准的吻合度。在此有两种诊断形式，其一，即症状的对应；其二，对某些症状分析后找出意义上的相同或相似。而西医对病的诊断显然不是仅仅依靠病人的临床表现，还要寻求影像、病理、生化等多方面的支持，很显然地要为病人的临床表现寻求肉眼观察不到的现象或实体，以期为这些临床表现作出解释，并以此为基础作出临床诊断。其中最大的区别是中医肉眼观察不到的现象成为了西医学诊断疾病的基础，也可以说西医学诊断疾病的基础或标准是那些中医经验不到的现象。即便是将那些肉眼观察不到的现象提供给中医变成其可经验到的，中医亦难赋予其相应的临床意义。

7. 中医学所谓的“证候”可能不存在所谓的“证候本质”，现代中医学家对“证候本质”的追求就像美学家追求“美的本质”一样，是一种“柏拉图之问”，乃源于对绝对同一性的盲信，其结果

只能是无功而返。中医学有关证候的研究应该做的是“如何辨证”而不是探求“证候本质”。具体某一疾病表现出的证候与另一疾病表现出的证候之间仅具有“家族相似性”。可以说具体某一疾病表现出的证候的所谓本质就是目前西医所能做的影像、病理、生化、分子生物学等方面的检测结果，它其实只不过是一些肉眼所不能观察到的现象而已。

8. 我们要时刻谨记中药学药物的“四气五味”、方剂学制方原则讲求的“君、臣、佐、使”都是隐喻的，“寒热温凉”、“酸苦甘辛咸”概念出现在药性理论中，是该语言的使用者意欲使用日常生活饮食中的概念解释药物的作用；方剂中的“君、臣、佐、使”无外乎是对国家行政机构职能的一种结构隐喻。《神农本草经》所谓“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宜撮合和者，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皆是以国家行政职能“君臣佐使”、家庭中的“子母兄弟”映射药物之间的关系。在方剂的现代研究中应注意的是方剂中的有效物质将在两个关键点出现变化，其一是在方剂的煎煮过程中；其二是在方剂进入人体之后。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方剂的两次管辖与约束”。煎煮过程中方剂的有效成分将遵循“上服从原则”，即方剂中有效成分的溶出将服从方剂煎煮过程的整体环境；而当进入人体后已进入人体的药物成分将面临重组。

9. 中医家的“经验”是难以完全继承的。任何一个中医家的经验都可以说是这位中医家的“私人经验”，这一经验是由中医家这一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病人构成的，也就是说在这一经验中有认知主体的参与，或者说这一经验包含着认知主体独特的主观感受，这种主观感受取决于认知主体的兴趣、爱好、知识结构与经历等等，故这种感受是因人而异的。对这种经验的表述也就形成了这位中医家的“私人语言”。而中医家所有“私人语言”的形式是：“我以为该病证是……”，“我觉得该病证是……”，它是一种隐喻，犹如我们说“人生是一次旅

行”、“人生是一场戏”、“人生如梦”一样，它与每个人的经历所形成的感受密切相关。

中医理论需要重新建构。中医理论重构的主线，可以或可能依据的是“意义理论”。她需要具有哲学、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素养的中医学家来重建，或者说需要中医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等多学科专家的通力合作。哲学家要做的是解决中国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关系，为中医理论寻求新的哲学理据；语言学家要明确的是中医的语言性质，指出中医语言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中医学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说出如此这般的理论；逻辑学家要做的是提供构建中医理论的逻辑方法；心理学家要做的是为中医学理论的形成提供心理学基础。在中医理论的研究与构建过程中不仅要陈述中医理论怎么说、说了什么，而且要揭示中医理论为什么这样说、其蕴含了什么。中医理论学家在以后 20 年所要做的工作，可能就是中医语言的分析。分析在中医理论建构中这些语言是如何被使用的，这些语言有什么样的认知意义。中医理论中充斥着大量的概念隐喻，甚至可以说中医理论是构建在隐喻的基础之上的。而隐喻是人类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故对中医概念隐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罗列以上常可令我陷入遐想或冥想的问题以叙其端，聊以为序。

贾春华

2010 年 5 月



内 容 摘 要



目的:从命题逻辑的角度研究《伤寒论》方证理论体系。试图达到或接近以下的研究目标——创建从逻辑学角度研究《伤寒论》的范式;创建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伤寒论》的范式;构建《伤寒论》的方证理论体系框架;构建《伤寒论》的合方理论与方剂语法语义假说。

方法:从蕴涵理论研究《伤寒论》中的条件句;从命题态度探讨《伤寒论》中含有“必然”、“可能”;“应该”、“可能”等模态词的条件句,挖掘孕育其中的模态逻辑;从意义理论研究《伤寒论》条件句何以成“真”的条件;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伤寒论》中的“证候”、“方剂”;从分析哲学的角度研究“证候”的“本体”等。

结果:从《伤寒论》中发现有关“名”的逻辑,窥及“因形命名”的印痕与“名”、“辞”、“说”的论辩形式;感悟到对“类、故、理”——“三物逻辑”的运用;提取了《伤寒论》的临床诊疗“实质公理”集;发现“证一方”与“证一法一方”治疗体系的推导异同;负概念在辨证论治中有重要的意义,负概念与正概念的联合应用隐喻证候的整体性;方证体系可由“单一方证”、“类方证”、“方证”三个基本概念构成,“合方证”是“单一方证”的“合取”,“合方证”仍可进一步分类,而形成新的“类合方证”,“合方证”、“类合方证”又构成新的“方证”。以集合论的方法得到“同一病与同一证”、“同一病与多证”、“同一证与多病”、“多证与多病”、“所有病与所有证”的关系;从语言学的视角抽象出“一首方剂看上去是一个句子”的论点;以语言学的观点提炼出证候的“语形”、“语

义”、“语用”；我们发现“以方测证法”之不可行的临床事实；“以方测证法”不满足充分条件命题的逻辑特征；“以病机命名的证候”与“以方剂命名的证候”是属性与个体的关系，是一种谓词与主词的关系；从哲学的视角观察到“中医之病因病机与西医的病因病理在认识论上具有不同的本体论”，西医的本体论是“本体论的事实”，中医的本体论是“本体论的承诺”。提出证候的整体性问题应该涉及显现出的“症状体征序列”如何与显现该“症状体征序列”的背景构成一个整体，及此证候是如何演变为彼证候、此证候与彼证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如何体现出或构成证候整体性的。

结论：“三阴三阳系统”是一个有别于“阴阳系统”的新形式系统；由“证一方”体系到“证一法一方”体系的概念间存在着逻辑关系的转换；现今证候研究负概念“赋值为0”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方证”划分证候法是与脏腑及其它证候划分法不同的一种“证候”划分法，“方证”划分证候法与其它证候划分法存在“交叉”关系，“方证”划分证候法自身对证候划分亦存在“交叉”关系，或者说方证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伤寒论》在构建“证一方”体系的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是“如果某某证，那么某某方”的充分条件假言命题，假如使用必要条件假言命题，亦多将必要条件假言命题的前件构成“合取式”，使这一“合取式”成为充分条件假言命题的前件，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充分条件假言命题；《伤寒论》的逻辑类型以广义模态逻辑为主体，特别是条件句中的有方有证条文可以径将其视为“道义逻辑”或“规范逻辑”。《伤寒论》中需要研究的“模态”不只是“必然”与“可能”，更多的是“应该”、“允许”与“禁止”；若以蕴涵理论来解释它则需要“相干蕴涵”来阐述，即借助相关的背景知识架起前者通往后者的桥梁；《伤寒论》中的“证候”、“方剂”可以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来阐释，即用“语形”、“语义”、“语用”的方法揭示症状体征间的联结、中药间的联结，探讨如此联结及在不同语境下的意义；“以方测证法”是

不可行的,或者说是测不准的,“以方测证法”在逻辑学上是“无效”的,即这种方法不是一种“能行的方法”,其得到的结论也不是“永真式”的。王永炎院士提出的有关证候研究论断“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是一连锁蕴涵,而连锁蕴涵是一常用的重言式,即为“永真式”。如果时间与空间区域都是确定的,同一“病”与同一“证”在具体的、确定的、现实的意义上是同一的;如果空间区域确定而时间区域不确定,同一“病”与同一“证”在具体的、确定的、现实的意义可满足同一性,但这一同一性取决于时间的时段,此时将出现的是“一病包含多证”;如果空间区域不确定而时间区域确定,不同“病”与同一“证”在具体的、确定的、现实的意义可满足同一性,即不同的疾病将在不同的空间经同一“证”的等同而表现为一致,此时出现的即“多病出现一证”。

目 录

绪论	1
一、叩响被遗忘的逻辑家园之门	1
二、中国秦汉以前的逻辑与中医学	6
三、《伤寒论》中的“名”、“辞”、“说”	9
四、《伤寒论》中的“三物逻辑”	14
第一章 《伤寒论》中的三阴三阳系统	20
第一节 三阴三阳源流	20
一、《内经》中的三阴三阳	20
二、《伤寒论》中的三阴三阳	24
三、“三阴三阳系统”是一个有别于“阴阳系统”的 新形式系统	27
第二节 《伤寒论》中的“实质公理”集	29
一、健康与疾病	30
二、证候与“随证治之”	31
三、从“方—证”到“证—法—方”	34
四、“证—方”与“证—法—方”治疗体系的推导异同	35
第三节 “证候—方剂”的辨证治疗推导规则	36
一、“证候”本源考	36
二、证候是什么？	43
三、证候概念转换间的逻辑关系	49

四、负概念在辨证论治中的意义·····	54
五、病证与方药之间·····	58
六、《伤寒论》方证理论体系框架·····	65
第二章 《伤寒论》中的条件命题 ·····	74
第一节 《伤寒论》中的条件句与假言命题 ·····	74
一、《伤寒论》中的条件句举要·····	74
二、《伤寒论》中的假言命题及其推理·····	76
第二节 基于蕴涵理论的《伤寒论》条件句分析 ·····	83
一、基于相干蕴涵原理的《伤寒论》条件句分析·····	83
二、基于反事实蕴涵的《伤寒论》条件句分析·····	91
第三节 《伤寒论》双结果条件句分析 ·····	95
第三章 模态命题与模态逻辑 ·····	101
第一节 模态逻辑述要 ·····	101
第二节 《伤寒论》中的模态命题及其推理 ·····	103
一、《伤寒论》基本模态命题·····	103
二、《伤寒论》基本模态推理·····	106
第三节 《伤寒论》中的广义模态命题与推理 ·····	108
一、《伤寒论》规范命题及其推理·····	108
二、《伤寒论》时态命题及其推理·····	114
第四章 基于逻辑推理的方剂假说 ·····	121
第一节 基于归纳推理法的张仲景合方理论研究 ·····	121
一、合方的动机与目的·····	122
二、合方的依据·····	122
三、合方的原则·····	124
四、合方中方与方间的“七情”关系·····	125
五、合方的功效·····	128

六、合方“先煎后合”与“先合后煎”之异同	129
七、张仲景合方的后世发展与特点	130
第二节 基于类比推理法的“方剂语法语义”假说	134
一、句子与方剂的类比	135
二、句子与方剂的结构层次	136
三、句子之“主谓结构”与方剂之“君药/主药”	137
四、句子之“词与词”与方剂之“药与药”	138
五、“方剂语法语义”假说指导组方	141
六、“选词造句”“遣药组方”的习惯	144
第五章 基于逻辑与语言的“自以为是”	146
第一节 从逻辑的角度看中西医结合	146
一、从模态逻辑的角度看中西医结合	146
二、中西医结合中的病证关系	153
第二节 从逻辑语言的角度看证候	161
一、证候语言	161
二、“以方测证法”之不可行论	167
三、“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	172
四、证候研究中的边缘	176
五、论证与辨证论治	182
六、有关《金匱要略》“同病异治”的诠释与成真条件	191
七、中医学：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	196
后记	201
逻辑、语言、哲学类参考书目	206
致谢	208

绪 论

一、叩响被遗忘的逻辑家园之门

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代中国都相继创造出了自己的医学，而今好像只有中医学仍在焕发着勃勃生机。公元前5世纪左右，古代中国、古印度和古希腊就产生了各具特色的逻辑学说，中国的“名辩”、印度的“因明”和西方的“逻辑”，三大逻辑流派均独树一帜，自成体系，在世界逻辑史上三足鼎立，交相辉映。然自秦而后，墨学衰微，几成绝学，以至在中国的天空曾回响着这样的声音——“中国无逻辑学”。

在当今的中医学领域，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美丽语言来形容、赞美《伤寒论》；在现代中国的哲学界无人不知中国的“名辩之学”。然在《伤寒论》中有无“名辩”的“逻辑思想”呢？《伤寒论》对“名辩”的“逻辑思想”是如何运用的呢？《伤寒论》中有无近现代意义上的“逻辑”？《伤寒论》中的逻辑是传统的“形式逻辑”抑或“辩证逻辑”？《伤寒论》中所蕴含的逻辑能否用“符号逻辑”来表述？对此一系列的问题恐怕很少有人知其“然”，能说出其“所以然”者更属凤毛麟角。

逻辑学的天空也不是想象中的那样蔚蓝。尽管人们对逻辑学的真理性、严密性、深刻性、简洁性、创造性深信不疑并盛赞不已，但人们几乎找不到逻辑学的确切定义，不清楚逻辑学该研究什么？能研究什么？对逻辑的划分更是仁智互见。甚至对目前国内逻辑界流行的分类标准，即把逻辑分为普通逻辑和现代逻辑

辑亦颇多微词,对辩证逻辑和二阶逻辑是否属于逻辑亦有质疑。“形式逻辑要现代化”、“紧跟世界逻辑发展潮流,与国际接轨”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对“什么是逻辑”在逻辑界虽然存在不同的声音,但逻辑界又几乎公认“逻辑是以研究推理形式及其有效性为对象的科学”。对于逻辑学应如何发展,姑且不做更多的探究。令我们更感兴趣和关心的是:《伤寒论》中有什么样的逻辑?她是如何利用这些逻辑进行命题或推理的?

本研究将从命题逻辑的角度研究《伤寒论》中的条件句,探讨《伤寒论》中的基本概念、条件命题及推理形式。拟分以下章节陈述我们的研究工作:

绪论: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名辩”探讨《伤寒论》中的逻辑;从有关“名”、“辞”、“说”和“三物逻辑”等角度考察《伤寒论》对逻辑的应用,以叩响从逻辑学观点研究中医学这一被遗忘的家园之门,架起中国名辩与西方逻辑研究《伤寒论》之桥梁。

第一章——《伤寒论》中的三阴三阳系统。考辨三阴三阳源流,构建《伤寒论》中的“实质公理”集,提取源于《伤寒论》的“证候—处方”的辨证治疗推导规则;且以“证候”研究为核心,分别以“证候本源考”、“证候是什么”、“证候概念转换间的逻辑关系”、“负概念在辨证论治中的意义”、“病证与方药之间”、“方证理论体系框架”为题,对“证候”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阐述。

第二章——《伤寒论》中的条件命题。首从西方传统逻辑假言命题的角度探求《伤寒论》中的推理;我们发现《伤寒论》在构建“证—方”体系的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是“如果某某证,那么某某方”的充分条件假言命题。假如使用必要条件假言命题,亦多将必要条件假言命题的前件构成“合取式”,使这一“合取式”成为充分条件假言命题的前件,从而形成以新的充分条件假言命题。为避免“蕴涵怪论”,我们依据自然语言的实际情况,沿用为逻辑学界所通用的“相干蕴涵”名称,以相干蕴涵原理为基础对《伤寒论》中的条件句予以分析,继以“反事实蕴涵”对《伤寒论》中的条